

文史点滴

从广济禅师到三平祖师

——由苏轼题跋《唐广济大师行录碑》说起

◎吴琼 卢晓容 文/供图

缘起： 宋代碑文里的历史掌故

中国古代素有刻石立碑以铭史的传统。近年，作为苏轼文章和书法传世的新发现，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苏轼题跋《唐广济大师行录碑》拓本一经面世，便引起广泛关注。此碑刻立于宋代，该拓本是明嘉靖墨拓本，有历代递藏者的题跋、篆注、收藏印等，弥足珍贵。

据《四库全书》史部十四《金石文考略》载：“苏文忠公《唐广济大师行录小楷书》（唐广济大师行录碑），王涯撰。涯与禅师同时，苏文忠公并跋。其字圆劲不必言，妙在运笔天然，若不知作小楷者，故为中楷中所难也。”可见此碑的书法艺术价值、文学价值、史料价值和宗教研究价值都极高。

《唐广济大师行录碑》碑文内容由唐代王涯（即王涯，唐吏部侍郎，谥守漳浦，乾符中人为工部尚书）撰写，记载着唐代广济禅师的生平事迹。二百多年后，苏轼在宋代重修的碑文上跋文，讲述了广济禅师的教诲与修行精神。

广济禅师俗姓杨，名义中，祖籍陕西高陵，因父仕闽，唐建中二年（781年）出生于福唐县（今福清市）。从小不食荤腥，少年时随父居泉州。14岁时，随父任官至泉州（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投宋州律师玄用出家，27岁时受具足戒。他精通经史，尤其擅长《周易》，先修习奢摩他（止）和三摩钵提（等持），后来修习禅那（静虑，即住心一境以静息念虑和思维真理）。为求证佛法，云游参学，遍访高僧，先依百岩怀晖禅师，历奉西堂智藏禅师、洪州百丈怀海禅师、抚州石巩禅师，再侍潮州大颠禅师，并成为大颠的法嗣弟子。

禅师于唐宝历初（约825年）回福建弘法，至漳州，入平和、漳浦，最后在漳浦与平和交界的三平山上“因芟剃住持，敞为招提”。当时他的弘法吸引学子云集，“学人不远万里，常有三四百人”。唐会昌五年（845年），因武宗毁佛，避居平和九层岩山，在大柏山麓建成三平寺继续弘法，并传授百姓桑麻耕织技术，带领民众垦田创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大中三年（849年），唐宣宗即位后，重新尊崇佛教。漳州刺史郑薰特请禅师出任漳州开元寺住持，并将其事迹上疏朝廷，宣宗敕封为“广济禅师”。咸通十三年（872年）十一月六日，广济禅师宴坐示寂，世寿92，僧腊65。

此文书写的年代初步断定是宋神宗元丰年间，落款“东坡居士轼跋”。约是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后所著。“东坡”是当时黄州东门外一块山间坡地，苏轼在此处养牛一头，垦田半顷，播种稻麦，自号东坡居士。受佛家思想的熏染，苏轼心情发生巨大改变，在《黄州安国寺记》中反思自己过去言行皆不中道，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勤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盖归诚佛僧，求一洗之！”

苏轼是在何种渊源之下书跋《唐广济大师行录碑》，还有待深入挖掘和

考证。但在字里行间，苏轼表达了自己对广济禅师的敬仰：“余独爱其禅师最后语云：‘吾生若泡，泡还如水，三十二相皆为假。汝等有不假底法身，量等太虚，无生灭去来之相。’呜呼！大师，吾得而见之矣！曹溪法门，惟论见性，斯非其一语印南宗者与？”读罢广济禅师的法语，苏轼发出感叹，表示自己有幸仿佛亲眼见到了大师！

苏轼对禅宗有着深刻的理解。禅宗南宗要义即是强调人人本具先天佛性，只要真智显露，就能明心见性、内外彻悟、见性成佛。在他看来，广济禅师印证了南宗曹溪法门要旨。他还在跋文中摘录广济禅师的偈子：“只此见闻非见闻，无余声色可呈君”，发出体用不二之慨。该偈末两句云：“个中若了全无事，体用何妨不分？”——“广济禅师”“全无事”这一心无所住、无有所得的禅悟，与苏轼的人生志趣是极为契合的。

广济禅师的禅法同样影响了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唐广济大师行录碑》言及广济禅师“复引韩愈侍郎，通入信门”。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反对唐宪宗迎佛骨舍利，上书《谏迎佛骨表》，被贬潮州任刺史。虽是被贬谪，但韩愈上任后因施教、移风易俗，结果潮州大治。元祐七年（1092年）苏东坡撰写《潮州韩文公庙碑》，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碑文中高度赞扬了韩愈的文学成就以及任职潮州的政绩。而后两句“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颇有东坡自况之意。可惜《潮州韩文公庙碑》的真迹已不能得见，而《唐广济大师行录碑》碑帖存世更显得珍贵至极。

据《祖堂集》记载，韩愈曾到大颠禅师处参问治理潮州事宜，禅师良久未答。侍者广济禅师在背后敲禅床，大颠乃云：“作摩？”对曰：“先以定动，然后智拔。”广济禅师以禅言智慧替大颠禅师解答了如何治理好潮州的良方妙策，韩愈豁然开朗，对广济禅师钦佩不已。云：“和尚格调高峻，弟子罔措，今于侍者边却有入处。”在潮州期间，韩愈与大颠禅师、广济禅师的往来，成为儒释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广为流传。

演变： 从禅师到祖师的发展脉络

广济禅师所处的时代，正是禅宗流派纷呈的时代，南宗由洪州、青原向五家七宗过渡。他四处参学各宗派高僧，博采兼容，对禅法有着深刻的领悟。《五灯会元》记载着著名的禅宗公案“三平受箭、石巩张弓”。广济禅师拜学于石巩禅师时，石巩以弓箭接机，他毫不犹豫攀胸以对。石巩30年间以弓箭接引学徒，只有广济禅师略明其旨，得到了他的首肯，他称自己终获“半个圣人”。后来广济禅师再悟得石巩张弓，直指本原的机锋，说：“登时将谓得便宜，如今看却输便宜。”自唐末以后，禅宗五家七宗有将近百位禅师在禅悟教学、开示和教化中都用过这则公案。在诸多禅宗典籍里，都有关于广济禅师问禅悟道的记录，可见他是一位师承南

宗，对达摩禅法有着透彻理解的高僧。宋以后至明清时期，广济禅师由一位禅宗高僧演变成被广大民众崇奉的“三平祖师公”，三平祖师信仰逐渐形成。

诸多碑文记载了广济禅师精通神通法术的传说故事。宋大观四年（1110年），三平寺第一次重修寺内碑刻时，当时的住持僧云岳在所附的修碑题识中提到广济禅师“鬼窟活计”的传说：“世之比拟广济大师鬼窟活计，乃谓小乘。如斯言议，涉在常情。俗谚并谈，道听途说。”在修碑时，云岳将其时已广为流传的禅宗典籍中所记载的广济禅师的语录，以及民间有关其传说补缀于碑。

《唐广济大师行录碑》以及寺内现存的明清碑碣中，加入了不少关于广济禅师的民间传说，相比于唐代最早关于广济禅师的史料内容有了较大的变化。这些故事还见于当时所撰修的一些志书，如嘉靖《龙溪县志》、明代何乔远《闽书》等等。这些传说故事结合闽南地理环境以及民间动物崇拜、神灵崇拜的背景，把三平祖师塑造成一位佛法无边、本领高强、能够驱妖降魔的地方保护神。

类似这种由高僧大德转变为神明祖师的例子在闽地还有不少，例如闽东平麓祖师、闽南清水祖师、闽西定光古佛和伏虎禅师、闽北三佛祖师、闽中卢祖师等。

三平祖师自唐宋以来就被当地民众广为崇拜。从寺内碑刻记载来看，其信众以漳州地区民众为主，上至漳籍朝官，下至地方文武官员、乡绅士庶以及黎民百姓。著名有宋吏部尚书颜师鲁、颜颐祖孙二人，明万历年间礼部侍郎林轩，明崇祯年间吏部主事陈天定，清乾隆《四库全书》正总裁、文学家三才学士蔡新，清康熙“一等海澄公”黄梧及其曾孙黄任简等。他们或捐修三平寺，或增置寺田，对三平祖师信仰的深化和传播，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平寺迄今香火绵延不绝，每年都会举办内容丰富的信俗活动。2014年，“三平祖师信俗”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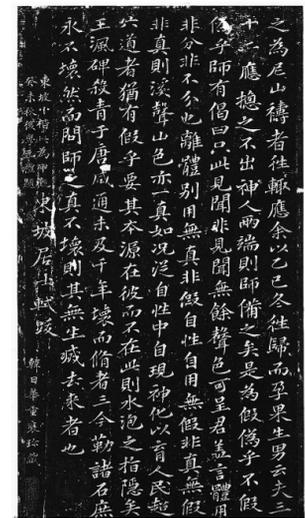
传播： 交流交往的桥梁纽带

三平祖师信仰作为佛教与闽地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其信仰体系、文化内涵等经过不断丰富与演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信俗文化。三平祖师信仰形成之后，主要流行于漳州地区，后来逐渐向周边地区辐射，扩散到整个闽南地区。据碑刻资料显示，早在元代就有温陵（泉州古称）人助三平寺修碑，乾隆年间又有“泉厦分府蒋元福等人”参与捐修三平寺。

明清时期，随着一些闽南人逐步迁移至港澳台及东南亚等地，三平祖师信仰也随之播迁。在港澳台及海外，有诸多三平祖师庙、三平宫、三平院、三平广济宫等庙宇，都是在三平寺祖庭庙名基础之上的演化。三平祖师文化包含的“广济、和谐、发展”“慈善大



苏轼题《唐广济大师行录碑》跋文一



苏轼题《唐广济大师行录碑》跋文二

爱、济人利物”等理念，植根于中华文化，深受海内外信众的认同与尊崇。

闽台一衣带水、渊源深厚，三平祖师信仰也在明清时期随先民迁徙传播到台湾，并发展绵延至今。据统计，台湾有三平祖师分庙50多座，信众数十万人，分庙常常举行盛大的三平祖师信俗活动。当前，三平寺以及三平祖师信仰已成为对台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在联系台胞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从广济禅师到三平祖师，这一信仰传承生生不息。作为闽台文化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深入研究阐释三平祖师信仰及其内涵，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于进一步凝聚人心、增进两岸情谊具有重要意义。

文人轶事



范文澜

乐于助人的范文澜

◎唐宝民 文 弘艺 供图

范文澜是史学大家，不但在学术上颇有造诣，还十分乐于助人。

丁明南先生回忆说，他于1950年6月在清华大学通过了研究生论文答辩，急于找工作，导师邵循正和系领导吴晗都劝他到范文澜身边工作。当时近代史研究所仍实行包干制，只提供食宿，定期发给制服，每月还有一点为数不多的生活津贴。他当时“对过这样辛苦的日子能否习惯，缺乏信心”。范文澜约他面谈后，才下决心到所工作。“他（范文澜）知道我曾因顾虑生活问题，对是否来所工作一度犹豫不决，建议我写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使手头宽裕些，还鼓励我将义和团运动的毕业论文复印……此事可以看出范老对我是多么关怀。”

荣孟源先生回忆说，范文澜不仅关心青年研究人员的成长，也十分关心勤杂人员的思想和学习情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的几年间，近代史所的勤杂员都是小同志。范文澜常在传达室找他们谈话，并且亲自检查他们学习的作业本和业余学校的成绩单。该所从解放区来的小同志在范文澜的关怀培育下，有几人已经大学毕业，一般都成了国家的干部。

董郁奎先生在《范文澜传》中记述过这样一件事：彝族学者刘尧汉写了题为《一个彝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在明清两代论解放前的发展过程——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之一例》的论文，全文长约3万字。范文澜看到后，在1956年5月24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稿件》一文，称赞刘尧汉实地进行调查，提倡实事求是的历史科学工作。说：“我觉得这篇稿子的妙处，正在于所用材料（几全是取自实地调查，无史籍可稽）。我们研究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总喜欢在画像上和诗经书经等等中国的名门老太婆或者希腊罗马等等外国的贵族老太婆打交道，对眼前还活着的山野妙龄女郎就未免有些目斜视，冷淡无情。事实上和死了的老太太打交道，很难得出新的结果。和妙龄女郎打交道却可以以诸佛菩萨的种种清规戒律里解脱出来，前途大有可为。刘尧汉先生的文稿，我看就是许多妙龄女郎之一，我愿意替他介绍一下……”

范文澜的乐于助人不仅体现在对青年学者的关怀上，也体现在他对学术研究的支持和鼓励中。他的行为不仅帮助了个人，也为整个学术界的进步做出了贡献。通过他的帮助和鼓励，许多年轻学者得以在学术道路上坚定前行，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范文澜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和传承。他的故事提醒我们，无论在什么领域，乐于助人和支持他人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文化丝语

教孩子说方言，为方言代际传承夯实基础

◎戴先任

据杭州电视台综合频道，近日，杭州一中学邀请临安本土语言专家，教学生学说临安话。目前学校已将方言教育纳入课后服务特色课程，在全校选拔方言推广员带动学生来共同学习。（2025年4月12日澎湃新闻新闻）

越来越多的地方都鼓励与教当地学生说本土方言。鼓励学生家长和孩子多说方言、鼓励孩子多用方言交流，或是倡议家长和孩子多说方言。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以往，一些地方为了推广普通话，“从娃娃抓起”，比如不让孩子在课堂上说家乡话，而只能说普通话。不仅如此，一些地方还不准公务员工作时讲方言……现实中，一些地方不当推广普通话，给方言的使用传承带来了危机，让方言的生存空间更加逼仄。

在不少地方，地方方言都出现了传承危机，存在代际传递断裂。如像年轻一代就鲜少能说出纯正的地方方言了，小孩子大多说普通话，一些小孩子连当地方言都听不懂。

孩子是我们的未来和希望，推广普通话要“从娃娃抓起”，方言传承也要“从娃娃抓起”，这样才能避免方言出现代际传递断裂。鼓励学生家长和孩子多说方言，营造方言保护、传播的良好环境，这是对过去一些地方不当推广普通话的“纠偏”，能更好地传承与保护当地方言文化，也是在保

护地方文化之根。

方言出现传承危机，遭遇“尴尬处境”，与普通话的“强势崛起”有关，但推广普通话和使用传承方言并非“此消彼长”“你死我活”的关系，两者可以并存。除了一些地方政府“强制推广”，让方言的生存空间更加逼仄，诸如人口流动加大等原因，都对方言的传承与延续带来了很大挑战。

“从娃娃抓起”为方言代际传承夯实基础，有助于让方言走出“断代危机”，摆脱没落命运。要鼓励家长和儿童多说方言，要让“方言文化进校园”，从家庭、学校到地方，都要为方言文化的良好氛围。当地人对方言也不要“母语羞耻”，而要拥有方言自信。还要能给方言多一些展示与传播的平台。比如通过短视频平台、当地电视台等，推广、传播方言文化等等。

各地需要真正重视方言的使用与传承，给方言留下充足的生存空间，让方言文化能够“活起来”，能够向下扎根，还能向上生长。要对方言文化实行全方位保护与推广，要提供能够促进方言文化生长充裕的空气、阳光与雨水。加强对地方方言文化的保护，让普通话与方言和谐共生、和谐共存，方言才能摆脱没落命运，走出传承危机。



三平祖师塑像

幸跌马摔死。村民为感念他为民办事，特雕像奉祀。此说表达村民对为民谋利的官员朴素的感恩情愫，难能可贵。

历史事实是，这位官员（老爹）在断案中并没有出事故，而且还在此布告的次年，又做了一件大事，即在郑店村主持修建了郑店殿。这项工程竣工后，立了一座石碑，碑额《南靖县朱侯筑郑店殿记》，立碑时间在万历八年。

这位官员姓朱，名衮，字文龙，别号钟峰。江西德化人，举人，万历六年任南靖知县。

施，龙磔陂可灌溉稻田3000余亩。历史上，毗邻水利的村民为争得水权发生纠纷。特别是遇干旱季，由此引发大规模械斗。争水事件惊动官府，官吏亲赴现场进行勘测，并经各级官

颁布而平息，在之后的岁月，争水纷扰时有发生，邻村异姓结下夙怨，发誓互不通婚。查乾隆版《南靖县志》，收录一篇雍正年间龙磔陂碑记，内容还是争水案件。

龙磔陂碑

◎江焕民

员裁断，发布告示。上述两通碑即是明代官府两次对龙磔陂争水重大事件的判案告示。

龙磔陂争水事件并没有因告示

万历七年碑附近有一座小庙，主祀三官大帝，配祀一位“老爹”神像，据村民说，这尊神像就是碑文主人公，当年为断案，亲临现场，在山涧不

补遗

承蒙热心村民引领，有幸见到又一通龙磔陂碑，碑额《两院司道详允龙磔水利碑记》，碑文题曰“邑侯钟峰朱公复龙磔水利碑记”，立碑时间是明万历七年。算起来这是见到的第二通龙磔陂碑了，之前见到的是《马平水利碑记》，立碑时间是明嘉靖四十五年。

龙磔，是个古地名，原属南靖县居仁里，今龙海程溪镇辖下人家、官园、洋奎三村接壤处。陂，是水利设



漳州平和三平寺